

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

陈建华

章培恒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的呼吁，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打通古今的论述，见诸《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下称《宏观与微观》）与《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下称《鸿沟》）这两篇文章，1999年初先后在《复旦学报》和《文汇报·文艺百家》上发表。同类文章可能还有，而两文收入先生自定的《不京不海集》中，应当是他最为重视的。他在《鸿沟》中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除了必须重视文学观念以外，把中国所谓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似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宏观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宏观研究”（《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574）。这对当时学界具振聋发聩之效，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体会到某种紧迫性，今天略可告慰先生的是，打通古今或古今演变几乎已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常识了。然而就在这一年不幸章先生患上了癌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先生面临一种学术与生命的紧迫性。的确，长期在古典文学领域里耕耘，一旦提出打通古今必然也给自己带来挑战和压力，如收入《不京不海集》中的几篇文章《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重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下称《开端》）都与现代文学有关，虽然为数不多，却涉及现代文学与古今演变的方向性问题，十分宝贵。从时间上看，这三篇文章写于2001年，都是在患病之后所完成的，由此也可看到某种紧迫性。

与“古今演变”的宏观研究一起，章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就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我认为宏观的研究显然是滞后了，目前非大力推进不可”（《不京不海集》，页569）。事实上提出古今演变是以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把握为基础的。从学术谱系来看，众所周知章先

生最初师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现代文学，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又师从蒋天枢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因此他本来就通古今。虽然自1980年代起所发表的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实际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有深厚的学养。这里举一个我个人接触的例子。2007年我完成《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开展》一书，请章先生赐序。出版社催得紧，他很快就写了。这并非一般推奖学生之作，文中言简意赅地论及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接受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纠葛，还引用了未为学者注意的1936年鲁迅给胡风的一封信，关于茅盾创作提出了包括风格及其与其他作家区别在内的三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也带有某种普遍意义。

“我在上初中时就读了茅盾的不少小说，而且颇为喜欢”，章先生在序文里说，事实上不仅对茅盾的小说，这篇2500字的短文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宏观观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这篇序文是章先生在华山医院病床上写的，至今难忘我在他病床之前作不情之请的情景。现在这本《革命与形式》已被翻译成英文，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如果先生在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章先生曾打算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惜没能如愿。他的病情时有反复，但有所好转就全力投入与骆玉明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的修订工作，该书在2007年出版，即《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其后又有所修订，201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二版。此书凸显了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观念，如书前《增订本序》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时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同的成

分及其历史渊源。”（页1）可见在原先架构的基础上体现古今演变成“新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学习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思想，除了有关的理论性阐述，这部《新著》也是一座充满具体例证与实验精神的丰富矿藏。

下面就《中国文学史新著》（下称《新著》）与“古今演变”宏观研究的关系及其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方面谈点粗浅的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教。

“读者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就多数人来说，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寻求愉悦”（《新著》，页1）。从这一问题出发，《新著》“基本着眼于在人性的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美感及其发展”。其所依据的“人性”的理论，我们知道，根植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的论述，也受到贾植芳先生的引导和启发，这些我在《不京不海集》的读后感中已作过一些阐述。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新著》与“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有何内在联系，并含有什么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章先生在《增订本序》中指出：“这部增订本对于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尽管对于探讨中国文学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来说，这仍是初步的工作，而且可能含有严重的讹误，但至少已经勾勒出了我们所认为的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首先这里的“现代文学”是先生在《开端》一文中所概括的：

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



章培恒先生
(1934—2011)

重视，并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不但对作为工具的语言进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继承本民族白话文学传统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辉煌的成绩，而且将包括描写的技巧、深度、结构、叙述方式等在内的文学的形式改革得在总体上现代化了，使文学的表现能力也达到了足以进入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程度。（《不京不海集》，页590）

那么《新著》怎样体现“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呢？我想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历史“分期”上不再如一般文学史根据秦汉唐宋等朝代来划分，而采用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分期，这样的思路在《宏观与微观》一文中已见端倪。其次清晰勾画了各个分期的文学进展线路，如《导论》最后概括的：“在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上古文学是我国文学的自发时期；中世文学的发轫期是文学的自发向自觉转化的时期，它的拓展期和分化期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是文学的自觉时期；近世文学则是文学的自觉性进一步强化的时期，其突出标志是虚构文学的重要性的地位的飙升，在某些时段甚至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页20）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即描述了文学中人性的美感表现及其艺术形式的历史进程。

这么概括有简略之嫌，如《新著》中把“近世文学”的

展开分为“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和“嬗变期”来描述，似比原先的思路更为复杂。的确“在近世文学的戏曲与通俗小说中经过虚构而出现的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却更为广阔、集中与尖锐，因而感情更为具体、激烈，更能突入读者的内心而引起深刻的共鸣；……而那些企图把文学从自觉方向拉回来的力量，除了从外部加以禁毁外，在文学内部的抗衡作用已日益衰落。所以，近世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在总体上进一步迈向自觉道路，并在美的追求上取得了新的、重大发展的时期”（页19）。对近世文学发展作如此浓描细写是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对于章先生来说，与凸显人性同样重要的是书写过程及其演绎方法，像这样的实证研究不仅是信史建构的必要前提，也旨在呈现人性与文学的历史进程的运动状态。

“近世文学”也是与现代文学的接榫之处，《新著》对于前后延续嬗变之迹一一交代，比照上引现代文学诸特征，不消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示了白话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在龚自珍那里可发现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相通的表述，或如《海上花列传》从“全知视角”到“限知视角”的叙事模式的转换，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在未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也会在艺术形式上发生突破。这些例